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

翻译学：
艺术论与科学论的统一
Translatology: Unity of Artistic
and Scientific Approaches

黄振定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为序)

顾问:

王宗炎 (中山大学)

刘重德 (湖南师范大学)

主任委员:

庄智象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杨自俭 (中国海洋大学)

黄国文 (中山大学)

委员:

王克非 (北京外国语大学)

冯庆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

申 丹 (北京大学)

刘士聪 (南开大学)

吕 俊 (南京师范大学)

朱志瑜 (香港理工大学)

许 钧 (南京大学)

张佩瑶 (香港浸会大学)

张美芳 (澳门大学)

汪义群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罗选民 (清华大学)

郭建中 (浙江大学)

郭著章 (武汉大学)

廖七一 (四川外语学院)

谭载喜 (深圳大学)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

总序

翻译研究是不是一门学科,翻译有没有“学”,现在不应该再费时论争了。董秋斯 1951 年就提出要建立翻译学,要写出两部大书,一部是《中国翻译史》,另一部是《中国翻译学》。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列·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在为《翻译研究丛书》写的总序中第一句就宣称:“The growth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s a separate discipline is a success story of the 1980s.”(1993) 我国自 1979 年就开始招收翻译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86 年国务院学位办公布了首批“翻译理论与实践”(二级学科)的硕士点,现在已有一大批以翻译研究为学术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1989 年以来,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都陆续设立了一些翻译研究项目,1992 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学科分类与代码》,把翻译学正式定为语言学(一级学科)中应用语言学(二级学科)之下的一个三级学科。虽然这个学科定位还不够科学,但这个学科的存在已被公认。这说明学科的产生和发展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而产生和发展的。

近 20 年来,这个领域的国内外学者都在努力加大研究力度,拓展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层次,陆续出版了不少翻译学研究的新成果。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为满足国内翻译教

学的需求并推动这个学科的发展,经过精心选择,引进了一套“国外翻译研究丛书”(现已出版 29 种),这在我国翻译界还是第一次。这套丛书在翻译教学和研究中已经并将继续发挥它的重要参考和借鉴作用。

但是引进与借鉴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结合自己的翻译研究和教学实践进行新的创造。怎样创造?许多学科的发展史证明,要创造就要中外结合。怎么结合?中国学术史告诉我们,要结合就要以自己的研究为根基,以国外的研究为参照,借鉴其理论与方法,改造和创立基本范畴,建立新的范畴系统。这个以自己为主的中外结合的原则就是学科建设的方针,也是我国翻译研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对一门学科的发展来说,引进国外的理论和方法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结合我们的翻译实践、翻译教学与研究,写出与我们自己的实际密切结合的论著。国内已经出版了一些这样的著作,对翻译学的建设起到了某种程度的推进作用,功不可没。但从理论的系统性和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上来说,我们还没有一本多数人认可的《翻译学导论》。此外,在中国传统译论的继承性研究、外国译论的借鉴性研究、翻译实践(包括翻译教学实践)中新问题的探索性研究、相关学科(如文化、心理学、语言学、文学、社会学、哲学等)的吸融性研究以及方法论的多层次研究(包括本学科的和相关学科的)等几个重要领域,也都缺乏高水平的系统研究的论著。

为了进一步推动翻译学的研究与发展,满足这门学科研究生教育的教学与研究的需求,我们特别组织国内专家撰写以翻译学学科本体研究为主的系统的理论性论著——“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在筹划此套丛书时,我们了解到中山大学“985”学科建设项目也正组织编写“中山大学翻译研究丛书”,我们很高兴把他们的选题纳入到“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中来。本丛书是一个开放性的系列,我们撰写、约稿的原则是:(1)翻译研究类的学术专著,充分反映本领域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2)追求理论的系统性和学术观念与研究方法的创新性,目的是对翻译学的发展和翻译人才的培养起重要的推动作用;(3)用汉语撰写。读者为高等学校翻译以及其他相关专业的教师、研究生,翻译学界、语言学界以及文学、文化、哲学与心理学等学界的翻译工作者和爱好者。

翻译是人类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手段和途径之一。I. A. 理查兹(Ivor Armstrong Richards)曾

说,翻译很可能是宇宙进化过程中产生的人类最复杂的一类活动。它的复杂性必然对我们的研究构成挑战,要求我们的研究不断拓展,不断创新,不断深化。从古至今,大体说来,人类对翻译的研究已有了直观经验式的、文艺学的、语言学的、文化学的等多种视角和方法。我们相信,我国的学者一定会同世界各国的同行一道,对人类这项重要而复杂的活动不断加以探索,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研究,为这门学科的发展作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编委会



翻译学：艺术论与科学论的统一

再版前言

在本书初版 10 年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还同意予以再版，的确令笔者感动万分。在深表衷心谢意的同时，还特别敬佩他们作为国家一级出版社所具有的高尚精神和深邃眼光：推崇理论，弘扬学术，重视价值，不唯时尚。

记得 1998 年本书在湖南教育出版社初版时，正值国内翻译界发生了“艺术”与“科学”的激烈争论，本书“合时适势”的针对性显而易见。时过境迁，10 年来国内外翻译界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实践的数量日增和质量提高自不待言，理论方面的繁荣发展也令人目不暇接，难以尽述。但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即“艺术”、“科学”之类的字眼已不多见，这样的话题似乎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野。既然如此，本书再版的学术价值又何在呢？

依笔者愚见，大概可以归纳为三点：以史鉴今，以纲张目，以虚则实。

首先，所谓“以史鉴今”，当然就是曾经的“艺术”与“科学”之争可以作为翻译理论史的经验教训，给我们今天乃至以后一段时期的译论发展以借鉴。那时的争论是“艺术”与“科学”各执一端，本书则主要通过对中外译论史和翻译实

实践的简要考察,阐明翻译理论的艺术论与科学论的辩证统一以及翻译实践的艺术性与科学性的辩证统一;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立艺术论与科学论相统一的翻译学的一些初步设想。这在全国翻译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赞赏者和批评者兼而有之。客观地说,前者居多,且多有笔者自觉难当的过誉溢美之词。甚至有读翻译方向的博士青年称:“这一本书便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一下子搞定了,这在学界还是很少见的。”他们的意见无疑是真诚而令我万分欣慰的,在此特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①其中主要看法之一,就是肯定了本书“以史鉴今”的意义。如有位专家评价说:

“本书对我国翻译理论研究的最大贡献就是:通过对中西方丰富翻译史料的细致分析,掘微探幽,梳理出各种观点和思想,从辩证和理论结合实际的角度,令人信服地阐明了翻译学中有关艺术性与科学性、艺术论与科学论的相互关系,有力地论证了语言的一般规律、双语转换活动以及关于它们的理论的矛盾的有机统一。”(摘引自向学校申请出版基金时,校外匿名专家的评审意见)

为了证明艺术论和科学论不可片面割裂和原本的内在统一,本书着重挖掘了各种片面观点的历史根源及其所隐藏的反面思想,揭示了这些观点的持有者本人没有意识到的矛盾,从而阐明了翻译理论从片面性和无意识的矛盾统一逐渐达到自觉的艺术论与科学论的辩证综合的逻辑进程。这样的逻辑进程构成了当今翻译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历史基础,而其核心观点就是:翻译中译者主观创造的艺术性活动内在包含着客观科学性,其忠实于原文的客观规律性活动又内在包含着主观艺术性。这其实也就是语言之作为艺术和作为科学的双重性,在翻译这种特殊语言活动中的表现。

就连持有不同意见的劳陇也承认:

II

- ① 至于批评者,不仅他们是同样的真诚,而且在笔者感到同样的欣慰之外,也特别觉得受益匪浅。笔者一贯对学术界只有吹捧而无批评的不正之风深恶痛绝,认为凡批评者,至少他们的坦率直言是必须提倡的,更何况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即使批评中有误会、误解、不当之处,我们也应该满怀博大的学术宽容,以作后来的警戒。因此,对于给我的批评,笔者从不作答,更无须反驳,仅在此向他们表达深深的谢意。

“黄振定博士的《翻译学：艺术论与科学论的统一》一书，无疑是一部浩瀚的翻译理论巨著。他根据辩证法矛盾统一的原理，提出了艺术论与科学论统一的论点，解决了长期争论的科学艺术的矛盾问题，为翻译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其影响之深远是无法估计的。”（摘自“劳陇先生给本刊主编的信”，《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年7期33页）

简言之，不少评论肯定了“艺术”与“科学”之争的历史必然性、关涉翻译根本的重要性，褒奖了本书的研究、方法和结论的合理性及其内容的新颖深刻性——“为翻译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其影响之深远是无法估计的”。或者至少，既然肯定本书探明的历史线索和当时现实，就不难承认，当今乃至以后作为历史的延续，仍然免不了有历史的投影。有着深刻历史渊源的“艺术”与“科学”问题，实际上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地被解决。它也许会改头换面。请注意这些年颇为盛行的“多元标准”论、解构“忠实”、“翻译即顺应、即变译”等；以及所谓的“描写”论：翻译理论可以且应该只描写翻译现象，不总结其规律或规则，也不提出任何原则；乃至更明确提出的：“超越艺术论与科学论的第三条道路”，即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因为艺术论和科学论是不讲人的主体性的。^① 凡此种种，这里不便详论，只能指出：“多元标准”论之类至少须谨防陷入“无标准”论的极端艺术观，“描写”论很容易重蹈否认翻译学的覆辙，而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则不仅是对艺术论和科学论的明显误解，而且再次凸显了其重要性。还有对笔者统一论的种种责难，如所谓统一论是“中庸”、“调和”，“艺术”与“科学”之间只有矛盾而无统一，等等。事实充分表明，曾经的争论既已解决又未完全解决。无论如

① 蔡新乐：《翻译的本体论研究：翻译研究的第三条道路、主体间性与人的元翻译构成》，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该书提出，要走出翻译的“科学观”和“艺术观”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对峙局面……翻译理论的确不应该只是徘徊在“科学观”和“艺术观”所含有的工具论与艺术论的两极之间，进而陷入实用主义的泥沼不能自拔；多元的视角，可能为翻译研究展现出新的途径。该书是想从翻译与人的关系这一视角入手，来考察它的历史性及其背后隐含的人本身的“构成”问题。这里除了认为艺术论和科学论不讲人之外，还说它们会陷入实用主义（请对照别人说的这两论“太空洞”），似乎多元视角可以克服其实用主义。如此断言，存在的问题是十分明显的：实用主义主张“有用即真理”，不正是否认普遍统一的真理和原则吗？

何,“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使更多的翻译理论爱好者、特别是青年学子了解那场争论及其历史,以助于他们深入探究新问题新观点,推动译论的健康发展,便是本书再版的必要性之一。

其次,所谓“以纲张目”,侧重的是艺术论与科学论辩证统一的普遍意义,它有助于整个翻译学体系理论的构建。曾有人指摘,这种辩证观是个可以处处套用的万能帽,因此没有什么实际价值。我们也从不号称什么奇特性,而是承认并强调,辩证法,包括艺术论与科学论的辩证法,的确是最普遍的道理,也是“ABC”这样的简单常识和基础。问题在于,不能把普遍的东西抽象化、简单化——当作大帽子或大空话,而应该真正把握其中包含的丰富具体的内涵;普遍和具体(特殊)、纲和目也是辩证统一的;科学的、真理性的普遍原则具有统领、指导具体事理的巨大作用,而且“纲举才能目张”,普遍性的原则错了便会贻误大局。这是人们往往诉诸最普遍的哲学理论的缘由所在,也正是对本书曾经的评论中体现的道理。如有专家认为:

“……对翻译这种特殊的双语转换活动的矛盾统一,作了根本性的、具有哲学高度的论证;因此也就使翻译实践的艺术性与科学性的辩证法及其理论的艺术论与科学论的辩证法得到了牢固的统一。另外,作者基于经过确证的翻译的基本观点,提出了自己对翻译学的体系构架及其基本特征的设想。”(摘引自向学校申请出版基金时,校外匿名专家的评审意见)

我们特别注意到,中外翻译界在漫长的理论探索中,个人经验式的主观论述较多,真正的科学研究较少,自然收效甚微。本书的特点则恰好是站在哲学辩证法的高度,以必要的普遍性和基础方法论视角,以及细致精到的分析论述,令人耳目一新,开创性地阐明了艺术与科学的客观关系。这一理论探索将有力推动我国翻译科学理论研究和翻译科学体系的形成。书中对翻译学的体系构架及基本特征的设想,也为人称道。或者说,关于艺术与科学辩证统一的道理,其实人们早已有所认识,但如此深刻地剖析翻译活动的艺术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以及翻译学的艺术论与科学论的统一,那时尚未见到。唯有这样的以哲学思维统摄科学和艺术思维的认识,才能拨开迷雾,纠正偏见,为翻译学奠定可靠的基础。正如刘重德指出的:

“这对范畴(即‘艺术’与‘科学’——摘引者注)之所以具有根本的

意义,不仅因为它们是长期争论的焦点,是翻译理论史的归结,更重要的是,它们确实涉及了翻译实践与理论的本质问题,因为它们同‘主观’与‘客观’这样一对普遍性的哲学范畴是那么明显直接地联系着。所以不可否认的是,这一论战的理论意义关系到翻译理论的学科性质与地位,其实践意义则关系到翻译活动的本性与特征,及由此产生的原则、标准、方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由此看来,《翻译学:艺术论与科学论的统一》……一书可以说它既抓住了翻译和翻译理论问题的根本,又抓住了当今翻译界争论的热点和焦点。与书题相吻合,它要解答的正是翻译理论及翻译活动分别是什么的根本问题。它所得出的结论是:翻译活动是艺术性与科学性的统一,翻译理论也同样是艺术论与科学论的统一。”(摘自“问题抓根本,方法要辩证——《翻译学:艺术论与科学论的统一》简评”,《外国语》2000年2期69~71页)

基础性与普遍性同在于哲学、哲学性,即常说的哲学是我们的思想基础,哲学是普遍的宇宙观、世界观、方法论。艺术与科学的概念直接联系着哲学的主观和客观概念,也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明确艺术(性、论)与科学(性、论)的辩证统一,也就是确立了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本书3.5节还专门讨论了主客观问题),也就是有了辩证法的普遍原则和方法论的指导。有了对辩证法的真正的、深刻的把握,即切实、具体的理解,便不难识别唯艺术论、唯科学论、翻译“无学”论以及理论无用或无关实践论等的片面性(包括将笔者的统一论视为万能帽、太抽象等),从而消除这些观点的割裂性思维与抽象形而上学根源。牢固树立了科学的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便不难克服任何其他和新的片面性——如把翻译学归属于信息论、符号学、跨文化交际学等忘记翻译之双语转换活动本体的观点,避免对翻译目的论、功能观、顺应论的扩大运用,以及关于翻译的本质定义、原则标准、目的条件、功能评价、方法步骤等乃至整个译学体系建构的某些误解。本书专辟一章就翻译学的构建提出了粗略的看法:其方法是原则规定性与经验描写性的统一,其性质是稳定性与开放性的统一,从而对实践的指导具有强制性与示范性的统一;并就一般翻译学体系提出了三大块构成:前提论证、原理阐明和实用分析。其中不少具体的意见和探讨也许有点过时,应该大有改进的余地,但我们贯彻的艺术论与科学论、主观性与客观性以及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坚持在翻译实践基础

上构建翻译学体系、阐明其具体内容，并不断推动其发展、完善其建设，仍不失其指导意义。

最后，所谓“以虚则实”，指的是本书论述的理论之“虚”，可以直接间接地指导实际的翻译活动。普遍的理论、哲学观、方法论不仅要服务于具体的理论，更须服务于实践，否则，再高超、精妙的理论也只能束之高阁、空虚无用。曾有年轻学者问我：你的艺术论与科学论辩证统一有什么实际意义？我说问题提得很好，其意义或价值，简言之就是：艺术论告诉你翻译时要尽量发挥好自已的主观艺术创造性；科学论告诉你同时又必须遵循语言规律，通晓双语差异及文化等因素，切实理解好原文的内容、形式和风格，尽量全面忠实地再现原文；这两方面看似相互矛盾，其实又是统一的：译者的主观创造性与原文的客观制约性（其实还包括语言规律、文化、社会因素等的制约）的矛盾，通过译者主观思维把握好一切制约因素，驾驭它们，灵活合理地把它们处理好，即通过译者的语言艺术创造，忠实地、科学合理地再现原文的内容、形式和风格。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专门用第三章讨论“翻译实践的艺术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其主旨应该很清楚：一方面阐明翻译实践本身的确包含着译者艺术创造性和科学忠实性的思维活动、精神劳动，另一方面，反过来说明在翻译实践中应该如何既发挥主观创造性又遵循客观科学性，即为辩证统一论的实践意义、实际运用提供示范。

倘若停留于抽象的理论，再辩证的研究也是大有缺陷的。书中以整整一章（全书 1/4 强）的篇幅探讨了翻译实践的艺术性与科学性，其中实例数量丰富、覆盖面广，涉及理解与表达、内容与形式、目的与评价、主观与客观几大方面，体现了对翻译实践较为系统全面的把握；还对各方面又进一步作了科学合理的细分，对具体译例的分析也往往有其独特之处。

这里的要点是对两对基本概念的明确分辨：艺术性与科学性，艺术论与科学论——前者用于说明翻译实践的根本性质，后者用于说明翻译理论的根本性质；二者互为照应，实践的艺术性决定理论的艺术论，实践的科学性决定理论的科学论。由此看来传统的“翻译”、“艺术”、“科学”之说，至少失之笼统，而实际是大大地模糊了问题，造成了一些混乱。

所谓“艺术性”和“科学性”（用于描述翻译实践即双语转换活动本

身的客观性质,包括译品的质量)与“艺术论”和“科学论”(指的是对于翻译实践的性质的主观看法,即翻译理论得以建立的立场与观点,及由此决定的理论倾向,所以也可称为“科学观”与“艺术观”),即“性”与“论”的联系与区别,显然就是实践与理论的关系。我们已在多处阐明这种关系,还特别强调,决不可将“艺术性”与“艺术论”或“科学性”与“科学论”简单地等同起来,或机械地相对应,因为现实的情况非常复杂:如主要从事科技翻译的人,也可能出于某些考虑而强调翻译的艺术创造性,即对翻译抱艺术论的观点,尽管按一般道理,他们应该对其科学性深有体会,从而坚持翻译的科学论;主要从事文学翻译者也会发生类似的“错位”现象。但是说到底,“错位”显然是由于在理论上未能弄懂“艺术”与“科学”两个概念的真谛,前述“超越艺术论与科学论的第三条道路”、“回归人之主体”的问题也在于此。究竟什么是“艺术”,什么是“科学”,在此也可简要重申:“艺术”的真谛是主观、不确定、心灵体验与灵活的创造性,具有感性审美和形象直觉的特征;“科学”的根本在于客观、确定、经验实证及稳定的规律性,具有鲜明的知性分析与逻辑思维的特征。

联系翻译活动(本体)、翻译主体,“艺术”表现为主观创造与直观摹拟的特点,“科学”表现为客观忠实和语言分析的特点,“二者常常交错融合,难以截然分开”。基于此,本书运用具有一定覆盖面的实例,尽量详细地分析、解说了在实际的翻译中,“解构—重组的科学性过程”是怎样发生的,“直观—摹拟的艺术性手段”是如何操作的,而所谓“二者的交错融合”,又在译者身上具有什么样的思维、心理状况。稍微细读一下本书的这一部分,不难看出“艺术”与“科学”的辩证统一其实根源于译者的现实思维活动,其中既表现为形象与概念之类的有机统一,又往往会有或凸显形象、直观、艺术,或凸显概念、推理、科学的不同情况——把这样的不同凸显分析、抽象出来,便有了我们所谓的“艺术性手段”和“科学性过程”的分别研究。随后,本书还从语言本身的内容与形式矛盾统一的角度,以实例讨论了原文与其译文之间内容与形式的不同对应情况,这当然也是一种必要的理论研究的分析和抽象。没有这样的分析抽象,便无法确切地了解翻译实践的真实面貌,也无所谓真正的理论,或只能凭空臆想、炮制虚幻的“万能帽”。而且在这样切实的分析、科学的抽象中,我们所揭示的“艺术”或“科学”的不同凸显、侧重,

以及内容与形式的翻译再现的复杂情况,不是很实在地说明了矛盾的复杂性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的道理吗?对此有不同看法的同人,我诚挚地恳请他们能够稍微牺牲点宝贵的时间,查验一下本书的有关章节。^①

因此,本书的再版至少也可以使更多的读者能够查验一下笔者 10 年来以多种形式表达的“艺术与科学辩证统一”的核心观点,“旁观者清”,或许还会引发新的不同意见和争论。“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或者可以补充一句:“创新产生于争鸣,更离不开继承”。看似“老套”的辩证法的探讨,对于翻译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应该不是没有必要的。

黄振定

于岳麓山下

2008 年 1 月 8 日

① 关于这一点,即翻译活动的艺术性与科学性辩证统一的具体复杂情况,后来我的博士生易经曾作了直接的、较细的探讨,提出了偏重艺术性或科学性的种种情况。请参阅拙著《翻译学的语言哲学基础》(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240~241 页。



序

刘重德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部翻译理论专著。具有这样深度的专著在我国尚属少见,究其原因,可能主要是翻译的实践性太强,以及作为一门新的学科建设的艰难。翻译界至今对于要不要翻译学争论不休,甚至有人视之为无谓之争,这恰恰证明了首先有必要澄清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毫无疑问,人们一般说的翻译究竟是一种科学还是一种艺术,或者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当然事关其根本性质、地位和价值。本书抓住这个问题,其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为了阐明问题,作者引人注目地给我们分辨了两对最基本的概念:艺术性与科学性,艺术论与科学论;前者用于说明翻译实践的根本性质,后者用于说明翻译理论、翻译学的根本性质;二者互为照应,实践的艺术性决定理论的艺术论,实践的科学性决定理论的科学论。由此来看传统的“翻译”、“艺术”、“科学”之说,至少失之笼统,而实际上是大大地模糊了问题,造成了一些混乱。不消说,基本概念的廓清,是极有助于改善这种局面的。

如果就此简单地把艺术性与艺术论、科学性与科学论分别对应起来,那无疑是一种机械论。作者竭尽全力论证艺术性与科学性、艺术论与科学论的内在联系和相互渗透。语言一般规律、双语转换活动以及关于它们的理论的矛盾的有机统一,是作者紧紧扣住的主题;这看来也的确是解决翻译学理论建设的关键。其实,人们对于这个辩证的道理

并不陌生,但要像本书那样集中深入地探讨,则需要有相当的眼光和勇气。

作者的眼光和勇气,绝不是停留于空谈和抽象,而是体现于扎扎实实的探究,体现于其中一以贯之的精到的辩证方法。具体地说,书中首先从中西方传统译论着手,通过细致的分析,挖掘出各种片面观点中所隐藏的反面思想,揭示这些观点的持有者本人没有意识到的矛盾,从而有力地证明了艺术论和科学论其实难以绝对地片面分割,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内在统一的。作者还进一步深挖种种片面观点的历史根源,整理出其中内在的逻辑进展,令人信服地阐明了翻译理论由片面性和无意识的矛盾统一,逐渐达到自觉的艺术论与科学论的辩证综合。这种辩证综合对于论证翻译学是最有说服力的——它不仅说明了翻译学诞生的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同时表明了其艺术论与科学论辩证统一的根本性质。作者接着花了大量的篇幅,运用具有相当覆盖面的实例,有评说有比较地阐明翻译实践中体现的艺术性与科学性的矛盾统一。其中涉及的理解与表达、内容与形式、目的与评价、客观与主观等几大方面,可以说是对翻译实践系统全面的把握;而各个方面所包含的层次性,又表现出精细的逻辑条理。最后,本书还借助西方普通语言学理论,立足于一般语言活动的本质和规律,对翻译这种特殊的双语转换活动的矛盾统一,作了根本性的、具有哲学高度的论证;因此也就使翻译实践的艺术性与科学性的辩证法及其理论的艺术论与科学论的辩证法,得到了牢固的确立。

另外,作者基于经过确证的翻译学的根本观点,提出了自己对翻译学的体系构架及其基本特征的设想,其中同样充分贯彻了辩证的原则,令人耳目一新。

而且,本书的整个工作,正如作者自己说的,也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特别是要想从根本上辨明翻译实践和翻译学的原理、性质、特点、要求等等,其涉及面之广、探究之艰深,是可想而知的。既然这项研究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也就不宜对本书求全责备。不管怎样,作者的这项研究都称得上是富于开创性的值得赞扬的工作。

万事开头难,我赞赏这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而且作者在翻译性质上的辩证的综合观点与笔者的观点大同小异,不谋而合,令人感到十分欣慰。日前,我在为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主办的会刊《英汉语比较

研究》(1997 论文汇编)所写的题为《威利斯·巴恩斯通谈翻译理论》一文中,针对巴氏所讲的翻译只能是艺术的片面观点,重新论述了翻译的性质问题。

翻译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中外都有争论。

笔者持辩证观点,认为翻译既具有科学性,又具有艺术性。我早在 1984 年出版的《翻译漫谈》一书中,以《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为题讨论过翻译的性质问题。现将其要点摘引如下:

我认为,翻译决非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而是本身具备特有的规律和方法的科学,同时也可以说是一种“再创造”的艺术。

我们说翻译是科学,是因为它有自己的规律。拿汉英互译来说,要想译得好,除应完全熟悉原文内容以及涉及的各方面知识这个前提之外,我们起码还必须对这两种语言具有较深的造诣,并进行一些比较研究和实践,基本上掌握它们的特点和异同,从而寻出对应的规律,然后才能有效地进行翻译,也才能保证译作的质量。

我们说翻译是艺术,理由如下:

创作的确是不容易的,下笔之前,作者必须体验生活,收集素材,还必须具有概括的能力和表述的技巧,去粗取精,塑造出成功的典型,然后才能写出好的作品来。翻译呢,译者也同样必须具备应有的条件,并严格遵守一定的科学(指文艺学、美学、修辞学等有关科学)的规律,字斟句酌地进行推敲琢磨,才能译好一个作品,才能保全原作的艺术价值。^①

笔者高兴地发现英国当代著名译论家纽马克(Peter Newmark)对翻译的性质有类似的看法。他说:“从性质上说,翻译既是科学,又是艺术。说它是科学,因为语言中有些东西已经标准化,只允许一种译法。例如科技术语一般只有一个译名。此外,还有常用的比喻、成语谚语、惊叹语等等,往往只有一种

① 参看刘重德《翻译漫谈》,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4~13 页。

固定的译法……

说翻译是艺术,因为语言中有些远非标准化,允许有各种选择,各种译法。但译文也必须受到科学的检验,以便一方面避免明显的内容和用词错误,另一方面保证译文同原文一样行文自然,符合语言环境的要求。要掌握翻译的艺术,必须具备几个条件……在文学翻译中,对原文的修辞手段必须有锐利的眼光;如果原作是文学作品,必须懂得如何在译作中运用这些手段。”^①

孔子说过:“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笔者又一次在年轻的黄振定博士身上深切体会到了夫子此言之非虚。在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上,他真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异军突起,可喜可贺,特为作短序如上,以表笔者赞赏欣慰之情。

^① 参看刘重德《浑金璞玉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年,第121页《彼得·纽马克谈翻译理论与技巧》。